

新注古代文學名家集

浩然集

孟浩然集校注

徐鵬校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孟浩然集校注/(唐)孟浩然著;徐鵬校注.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2 重印
(新注古代文學名家集)
ISBN 7-02-000726-0

I. 孟… II. ①孟… ②徐… III. 唐詩—作品集
中國 IV. I222.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97)第 27230 號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內大街 166 號)

北京通縣電子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字數 226 千字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13 插頁 2

1989年8月北京第1版

1998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 3201—8200

定價 15.50 元

前 言

一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卧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李白：《贈孟浩然》

在李白筆下，孟浩然對仕進似乎抱着一種完全超脫的姿態。他「紅顏棄軒冕，白首卧松雲」，幾乎成了一位徹頭徹尾的隱士。從表面看來，孟浩然一生沒有取得功名，長期過着隱士式的田園生活，也寫了一些歌頌隱逸的作品，的確較為接近一個隱士的形象；但在他的內心深處，在他的精神世界，與一個隱士的形象確又存在着較大的距離。在他的詩歌裏，他曾一再申言：「忠欲事明主」，「端居恥聖明」，「魏闕心常在，金門詔不忘」，對政治表現出無比的熱情。甚至直到晚年，還為自己的政治遭遇鳴訴不平：「猶憐不調者，白首未登科」詩人的思想仍然是人世的。一方面，他對政治抱着熱烈的嚮往：「冲天羨鴻鶴」；但另一方面，却又不願為此而喪失一個知識份子應有的品格：「爭食羞雞鶩」。既想追求功名，企望在政治上有所成就，但又不願趨炎附勢，要求保持知識份子的清高，這種仕與隱的矛盾，幾乎支

配了詩人的一生。這就是孟浩然的真實形象。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今湖北襄樊市）人。他一生的經歷比較簡單，生於武則天永昌元年（公元六八九年），死於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公元七四〇年），終年五十二歲。他一生雖然經歷了武則天、中宗、睿宗、玄宗四朝，但主要生活在唐玄宗統治的被歷史學家所詭稱的「開元盛世」。這一時期，唐王朝正處於政權穩定後的上升時期，人民生活相對安定，統治者對官僚的選拔，已從魏晉以來被世族壟斷的「九品中正」制，改爲以科舉爲主的新的取士制度，這就爲庶族知識份子登上政治舞臺大開了方便之門，大大激發了廣大知識份子的從政熱情。作爲唐代山水田園詩派開創者之一的孟浩然，儘管一生的絕大部分時間過着隱居田園和遨遊山水的悠閒生活，但在他的內心深處，却從來沒有忘記過對政治上的懷戀和追求，他並沒有能够超脫這一時代給他的影響。

在三十六、七歲以前，孟浩然主要在家鄉過着閉門讀書的隱居生活。《舊唐書·文苑傳》說他「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其實他隱居鹿門山的時間並不長，現存浩然集中以鹿門爲題的詩僅有兩首：《登鹿門山懷古》和《夜歸鹿門歌》。前者寫他清曉來此尋幽探勝，夕陽中迴艫返家，顯然不是隱居于此的作品；後者則寫他傍晚返歸鹿門的情景，大概就是他隱居鹿門時所作。此外，在詩中只是偶然提及。他長期居住的地方，則是在襄陽南郭外他自己的莊園——南園。這在他的作品裏曾一再提到：「敝廬在郭外，素業唯田園。左右林野曠，不聞城市喧。」（《澗南園即事貽皎上人》）「余亦忘機者，田園在漢陰。」（《都下送辛大之鄂》）在遊越回來以後，寫了《仲夏歸南園寄京邑舊遊》，直到他的死：「終於冶城南園。」（王

士源《孟浩然集序》除了入京應試、出外漫遊和短暫的幕府生活，詩人一生的絕大部分時間是在這裏度過的。他在以後回憶中青年時期的這段生活時說：「我昔與汝輩，讀書常閉門。」（《入峽寄弟》）「爲學三十載，閉門江漢陰。」（《秦中苦雨思歸贈袁左丞賀侍郎》）「少年弄文墨，屬意在章句。」（《南陽北阻雪》）可見在這段時間裏，他把主要精力還是放在閉門苦讀上，其主要目的，就是想通過科舉考試走上仕進的道路。當然，隱逸思想也在他思想上佔有一定的地位，他除了曾去鹿門山隱居外，還與一些禪師、上人、山人、逸人等交往，或則與他們談玄說道：「談玄殊未已，歸途夕陽催」，「漸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或則與之詩酒遨遊：「竹引携琴人，花邀載酒過」，「宴息花林下，高談竹嶼間」。過着「耕釣方自逸，壺觴趣不空」的隱士式生活。但就在他高唱「漸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的同時，在另一些詩歌裏，却透露了他思想上的另一個側面：「吾與二三子，平生結交深。俱懷鴻鵠志，共有鶴鷗心。」（《洗然弟竹亭》）如果說這裏的「鴻鵠志」僅是對仕進思想的較爲隱蔽的一種表示，那末，在《田園作》一詩中，這種要求用世的思想就表現得更爲明顯了：「粵余任推遷，三十猶未遇。……望斷金馬門，勞歌採樵路。鄉曲無知己，朝端乏親故。誰能爲揚雄，一薦《甘泉賦》。」他一方面雖然「望斷金馬門」，迫切希望能在政治上有所成就，但由於「朝端乏親故」，因無人引薦而讓光陰白白在田園中消逝表示了強烈不滿。「誰能爲揚雄，一薦《甘泉賦》」簡直是在大聲疾呼，有點近乎急不可耐了。在《晚春卧疾寄張八子容》詩中又說：「賈誼才空逸，安仁鬢欲絲。……常恐填溝壑，無由振羽儀。窮通若有命，欲向論中推。」則從中透露了由於政治上的不得意而產生的某種消沉、失望情緒。由此可見，即使孟浩然早年

在家鄉隱居期間，也絕不是一個對世事完全忘情的隱士，即使他對隱逸生活抱有濃厚的興趣，由於時代的原因，他絕不可能像漢末亂離時代的龐德公那樣，走「採藥不返」的道路。

身在江湖，心懷魏闕，這大概是促使孟浩然在開元十二、三年間離鄉去洛陽的主要原因。由於運輸的關係，當時自江淮一帶北運的糧食，只有少量運去長安，而大部囤聚在洛陽，因此就出現了唐代初期一些帝王「就食東都」的現象。高宗、武后和玄宗前期都曾長期在這裏居留，這裏就成了當時除長安以外的另一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浩然之前往洛陽，主要目的就是想通過遊歷廣交朋友，博取社會聲譽，並從而尋求政治上的出路，這是當時大多數文人在登上政治舞臺前所走的道路。開元十三年，玄宗從洛陽出發，舉行東封泰山的盛典，這裏成了朝廷官員和文人的匯聚之所，這或許也是詩人選擇這一時期來洛陽的另一原因。張九齡當時任中書舍人，也隨侍在洛，浩然與九齡的結識，大概就在這一時期。其他在詩中提到的如包融、儲光羲、綦母潛、奚三、李十四、袁十等人，大致也是在這時結交的朋友。初到洛陽，詩人的心情是較為開朗的，過的是「鬪雞寒食下，走馬射堂前」（《上巳日洛中寄王九迥》）和「相携竹林下，對酒不能罷」（《宴包二融》）的遊樂生活，寫下了像「酒酣白日暮，走馬入紅塵」（《同儲十二洛陽道中作》）那樣較為豪放的詩句，充滿了對生活的激情。但這次入洛，除結交了一些朋友，遊覽了一些名勝古蹟之外，並沒有在仕途上取得什麼進展，於是這裏停留了一年以後，又發出了「年年白社客，空滯洛陽城」（《李氏園臥疾》）的感慨，而思「歸田羨子平」了。

大概在開元十四年的春夏之間，浩然從洛陽回鄉，不久，即經湘水去嶺南探訪袁拾遺，途中曾去汨

羅江憑吊屈原。因中途得知袁已去武陵，即從嶺北回棹去武陵訪問。至秋天，經洞庭湖回鄉，寫了《洞庭湖寄閻九》一詩，其中有「遲爾爲舟楫，相將濟巨川」等語，想來當時已有準備入京應試的打算了。

孟浩然赴京應試是在開元十五年底。就在這年春天，他曾去過一次揚州，這就是李白在《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詩中所說的「煙花三月下揚州」。這次揚州之行大概有七、八個月時間，回鄉已經歲暮。

新、舊《唐書》都說浩然年四十遊京師，應進士，不第。這一年（開元十六年），浩然是在長安度過的。由於考試失利，在他思想上引起了很大波動，一方面，他對自己的政治前途產生了懷疑與動搖；「躍馬非吾事，狎鷗真吾心。」並從而觸發了對自己故鄉的深沉懷念：「淚憶峴山墮，愁隨湘水深。」《秦中苦雨思歸贈袁左丞賀侍郎》但另一方面，却又不甘心就此與從政觀念徹底決裂：「欲隨平子去，猶未賦《甘泉》。」《題長安主人壁》對自己的政治生活，仍然抱着希望與期待。但當「黃金燃桂盡」（《秦中感秋寄遠上人》）、「百鎰罄黃金」（《秦中苦雨思歸贈袁左丞賀侍郎》）而感到長安居大不易的時候，在「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歸」（《留別王維》）的情況下，才不得不作出了「祇應守寂寞，還掩故園扉」（《留別王維》）的最後決定，從而結束了這次將近一年的長安之行。在他這時的詩中，雖然一再聲稱「拂衣從此去，高步躡華嵩。」（《京還留別新豐諸友》）「物情今已見，從此願忘言。」（《寄趙正字》）似乎表現出相當曠達的樣子，但在他的內心深處，還是非常不平靜的：「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歲暮歸南山》）他爲自己政治上的不得意竟至輾轉反側、無法入睡了。仕與隱，人世與出世，在詩

人思想上仍然佔據着重要的位置。

浩然從長安回到家鄉已是開元十七年的春天，不久就有了入越之行。此次吳越之遊，係取道洛陽，循汴水而下，經潤州、杭州，再去天台山遊覽，順流由上虞江到達會稽。在會稽停留的將近兩年時間裏，他遊覽了若耶溪、雲門寺、鏡湖、大禹寺等名勝古蹟，結識了薛八、崔國輔、孔伯昭、沈太清、朱昇、謝南池、陶翰以及徐起居、衛明府等一批朋友。在開元二十年冬天，從會稽出發，去樂城探訪多年不見的老友張子容。明年春，即從樂城出發，經潤州溯江而上，回家已是開元二十一年的仲夏季節。從開元十七年至本年回鄉，前後足足有四年時間。這期間，詩人的思想情緒是低沉的，在他從洛陽出發時寫的《自洛之越》這首詩中，充分表達了他當時的消極心情：

名！
邊邊三十載，書劍兩無成。山水尋吳越，風塵厭洛京。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且樂杯中酒，誰論世上

政治上的不得志使「忠欲事明主」的孟浩然失去了前進的信心，他想從遨遊山水中得到心靈上的慰藉，這或許就是詩人在回鄉不久緊接着就有吳越之行的一個主要原因。這次漫遊，他一面沉浸在越地的佳山水中，高唱着「回瞻魏闕路，無復子牟心」（《初下浙江舟中口號》），「願言解纓紱，從此去煩惱」（《宿天台桐柏觀》），「揮手弄潺湲，從茲洗塵慮」（《經七里灘》），似乎表現得十分超脫；但另一方面，却又在低吟着：「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宿建德江》），「誰憐問津者，歲晏此中迷」（《浙江西上留別裴劉二少府》），表現了他無法超脫現實的苦悶心情。在《久滯越中贈謝南池會稽賀少府》和《泛

舟經湖海》兩首詩中，則更爲明確地發出了「未能忘魏闕」、「魏闕心常在」的對仕進強烈要求的迫切呼聲，山水勝景並沒有沖淡他思想中對仕途的嚮往與憧憬。

就在從越地漫遊回鄉的這年秋季，詩人又有過一次入蜀之行，年底即在蜀地度歲，到次年春季才回鄉。在開元二十二、三兩年時間裏，由于張子容的休沐還鄉，詩人大部分時間與張在一起過着詩酒唱和的宴遊生活。從《和張明府登鹿門山》詩中「忽示登高作，能寬旅寓情」之句推測，在二十二年重陽前後，浩然曾有過一次短時期的外出。在二十四年秋季，又有過一次湘贛之遊。在這段時間裏，他一方面聲稱：「扇枕北窗下，採芝南澗濱。因聲謝朝列，吾慕潁陽真」《仲夏歸南園寄京邑舊遊》；「煩惱業頓捨，山林情轉殷」《還山贈湛禪師》；表示出心情十分平靜而又悠然自得；甚至當正在任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採訪處置使的韓朝宗想約他同至京師，對他加以推薦時，也因他正與老朋友在一起飲酒歡聚而沒有赴約。但在他的作品裏，還一再表示：「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臨洞庭》；「猶憐不調者，白首未登科」《陪廬明府泛舟迴峴山作》；始終對政治未能忘情。

正是在上述這種心理狀態的支配下，當開元二十五年張九齡被貶荊州長史召他人幕時，很快就成了九齡幕府中的一員。這一時期，他隨九齡外出行縣、祠祭、遊獵，幾乎成爲他一生中最高興的時期。他爲自己能够得到張九齡的賞識而感到歡欣鼓舞：「觀止欣眉睫，沉淪拔草萊。坐登徐孺榻，頻接李膺杯。」《荊門上張丞相》並不時在詩中表現出一種歡快而近乎自豪的情緒：「何意狂歌客，從公亦在旂」《從張丞相遊紀南城獵戲贈裴迪張參軍》；「客中遇知己，無復越鄉憂」《陪張丞相登嵩陽樓》。

但這一幕府時期的生活並不長，到二十六年春季，大約由於身體健康的原因，又從九齡幕府辭歸，回襄陽養疾。在這一階段的作品裏，他曾一再提到「養疾衡茅下」（《重酬李少府見尋》）、「已抱沉痾疾」（《送王昌齡之嶺南》），說明在開元二十六年到二十八年這一段時間，詩人主要是在家鄉抱疾閉居。

開元二十八年，王昌齡自嶺南赦回，過襄陽時，浩然與之暢飲，因「食鮮疾動」，終於冶城南園，結束了詩人並不得意的一生。

二

孟浩然是唐代山水田園詩派的開創者之一，但山水田園詩能在詩歌創作中取得應有地位而成爲一種創作流派，當然要上推到晉宋之間的陶淵明和謝靈運。

陶淵明寫作了大量田園詩，對恬靜的田園生活作了由衷的歌頌，因此從晉代一直到孟浩然的時代，他在一般人的眼裏是一個與世無爭的曠達的隱士。但實際上陶淵明對現實是非常不滿的，他看不慣當時社會的黑暗和腐敗，但又感到無力反抗，於是從現實鬭爭中退了下來，走上了逃避退隱的道路。正因爲他對現實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時常透露出一種對現實社會的不滿和批判。他在退隱以後，經受過「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的困苦生活，也親自參加了勞動；「晨出肆微勤，日人負耒還」，「晨興理荒穰，帶月荷鋤歸」，從而寫出了像「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秉耒歎時務，解顏勸農人。……日人相與歸，壺漿勞近鄰」，以及「春蠶收長絲，

秋熟靡王稅」一類充滿了與勞動人民之間真誠、深厚感情和反映勞動人民願望的作品。

孟浩然儘管也過着隱居生活，也寫了不少田園詩，而且還說過「嘗讀《高士傳》，最嘉陶徵君。

日耽田園趣，自謂羲皇人」(《仲夏歸南園寄京邑舊遊》)和「我愛陶家趣，林園無俗情」(《李氏園臥疾》)一類贊美和景仰陶淵明的話，但是由於他一生過着悠閒的莊園主生活，因此缺乏像陶淵明那樣的勞動體驗以及與勞動農民之間的感情。他曾在《山中逢道士雲公》一詩中說：「酌酒聊自勸，農夫安與言！」在這裏，詩人不是把自己放在與勞動農民平等的地位，而是居高臨下地採取孤芳自賞的態度。正是這種生活和思想上的局限，使他的詩歌內容比較狹仄，沒有能够反映更爲廣闊的社會生活內容或勞動農民的願望和感情。他的大部分作品，抒寫了與一些高人、隱士以及與他同一知識階層人士的交往，表達了他們之間宴遊、酬贈、離別和懷念等等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或者表現對田園隱居生活的嚮往和歌頌，抒發自己因政治上不得志而產生的失意情緒。同樣是寫田園隱居生活，他與陶淵明也有所不同，陶的歸隱是一種思想上的覺醒，「覺今是而昨非」，是歸真返樸的表現，因此心胸坦然而對田園生活衷心加以贊美。孟浩然的隱居却在一定程度上帶有某種不自覺的無可奈何的成份，他雖然寄情於山水田園，但始終沒有忘掉對政治的追求，在仕與隱、理想與現實之間進行掙扎，因此，即使在描寫恬靜的田園生活和尋幽探勝的山水、行旅詩中，也經常透露出這種思想上的痛苦和矛盾。在他的作品裏，我們只能看到一個在封建社會裏政治上不得志而又潔身自好的知識份子形象。孟浩然的田園詩，在描寫田園生活和語言風格等表現技巧方面，的確受到了陶淵明的深刻影響，但整個作品

的思想內容，却並沒有能夠達到陶淵明所已經達到過的高度。

至于謝靈運，由于在寫作山水詩這一題材上的某種聯系，浩然對之有所學習和借鑒，據粗略統計，孟詩中運用前人詩歌中詞彙最多的是謝靈運和陶淵明。但在他的山水詩中，由於注入了企求隱逸和個人的失意情緒，因而摒棄了謝詩那種「富豔」和「繁蕪」的表現手法，從而達到了自然省淨的境界。因此，除了寫作題材，他的山水詩與謝靈運的山水詩在創作風格上並沒有必然的繼承關係。

作為盛唐山水田園詩的開創者和代表人物，孟浩然能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取得重要的地位，當然離不開他作品所具有的獨特的藝術成就。

前人稱贊孟詩「韻高」，這的確是他作品的一個重要特色。宋代的蘇軾對孟詩下了一個評語：「孟浩然之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爾。」（《後山詩話》引）嚴羽在《滄浪詩話》中則說：「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缺少學力與才氣，這一點比較容易理解，但他們所稱贊的「韻高」和「一味妙悟」，就顯得抽象和有點不可捉摸。清代的王士禛標榜神韻，他在對浩然《晚泊潯陽望香爐峯》一詩的評論中說：「詩至此，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挂角，無跡可求，畫家所謂逸品是也。」（《帶經堂詩話》）他在這裏所說的「羚羊挂角，無跡可求」與嚴羽所說的「一味妙悟」，其實都是指他們所主張的作品的「神韻」。浩然這首詩，是寫泊舟潯陽時的所見所感：

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精舍近，日暮空聞鐘。

全詩渾然一體，清空雅淡，表現了一種超然的韻致。在內容上，思想超脫而不執著，即所謂「興趣所到，忽然而來，渾然而就」，言有盡而意無窮。在形式上，不斤斤於字句的刻意追求，平淡自然，一氣呵成，「既末可以句摘，亦未可以字求」。這或許就是蘇軾所說的「韻高」和嚴羽所說的「妙悟」的具體內容。這類作品，如《秋登萬山寄張五》：

北山白雲裏，隱者自怡悅。相望試登高，心隨鴈飛滅。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發。時見歸村人，平沙渡頭歇。天邊樹若薺，江畔舟如月。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

又如《萬山潭》：

垂釣坐磐石，水清心益閒。魚行潭樹下，猿挂島藤間。游女昔解佩，傳聞於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還。

再如《過故人莊》：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不論是抒發登高時對友人的懷念，或寫垂釣的樂趣以及與故人歡敘的情意，都顯示出一種從容不迫、閒淡飄逸的韻致。

孟詩的另一特點是「清」，這在他同時代人的評論中就已經有所論及。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中說：「間遊祕省，秋月新霽，諸莫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

咸聞筆不復爲繼。」杜甫也稱贊他「清詩句句盡堪傳」（《解悶十二首》）。這裏所說的「清」應該是指詩歌所表現的清幽閒淡的意境和清新明淨的語言特色。由於詩人生活在一個比較安定的社會裏，一生過着平靜恬淡的田園生活，經常與一些隱士、僧道交往，詩酒遨遊，生活過得平靜而缺少波瀾。除了由於因仕途不得意而在作品中不時流露出的一點淡淡的哀愁和不滿情緒外，對生活缺少一種強烈的激情，從而在作品中缺少一種奔放浩瀚的氣勢。如《夜歸鹿門歌》：

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棲隱處。巖扉松徑長寂寥，惟有幽人自來去。

月光下的巖扉松徑無疑是清冷幽寂的，再加上詩中出現的那個獨來獨往的「幽人」形象，爲全詩創造了一種高曠清遠的意境。

又如《題大禹寺義公禪房》：

義公習禪寂，結宇依空林。戶外一峯秀，塔前衆壑深。夕陽連雨足，空翠落庭陰。看取蓮花淨，方知不染心。結宇空林，巖壑特勝；夕陽帶雨，空翠滿庭。其景色何等清絕！再加上養靜習禪的主人公，更增強了清幽恬靜的情調。

再如《宿建德江》：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孤舟曠野，冷月清江，爲身處客地的他鄉遊子勾引起多少新愁！情景相融，使全詩帶上了一種清冷

孤寂的感情色彩。

這類詩歌，不但描寫了清幽的景物，還表現了詩中主人公孤高寂寞的內心情緒，這種客觀景物與主觀情緒的相互滲透，為作品創造出一種清淡曠遠的藝術意境，從而構成了作品的「清幽」特色。

孟浩然的山水田園詩，語言清新明淨，它不像謝靈運那樣刻意追求詞句的華美，與陶淵明的「田家語」相比，則又顯得更更有文采。如前舉各詩中的「天邊樹若齊，江畔舟如月」、「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夕陽連雨足，空翠落庭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等句，所寫都是眼前景物，而通過詩人運用簡練樸素、明白如話的語言加以藝術概括，寥寥數筆，就勾勒出一個鮮明的藝術意境，給予讀者以具體、深刻的印象。從這裏可以看到詩人在駕馭語言方面的高超能力。

當然，孟集中也有像「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臨洞庭」、「照日秋雲迴，浮天渤澥寬」（《與顏錢塘登樟亭望湖作》）、「山藏伯禹穴，城壓伍胥濤」（《與杭州薛司戶登樟亭驛》）、「歌馬憑雲宿，揚帆截海行」（《尋天台山作》）一類風格比較雄壯的詩句和像《盈盈樓上女》、《美人分香》、《閨情》、《春怨》等風格綿麗輕婉的作品，但這究竟不是他作品風格的主要傾向。

三

孟浩然的集子，最早應該是編成三卷的本子。《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孟浩然詩集》三卷，下云：「弟沈然，宣城王士源所次，皆三卷也。士源別為七類。」這裏說「皆三卷也」，似乎在當時應該有

孟浩然和王士源所編的兩種均爲三卷的本子，而把內容區分爲七類，則是王士源所做的工作，這在現存宋本《孟浩然詩集》的王士源序中也有所提及。至於孟浩然編的那個三卷本的面貌究竟如何，因爲沒有流傳下來，後代的著錄也沒有提及，情況就不太清楚了。《崇文總目》、《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諸書，雖題名或作「孟浩然」，或作「孟襄陽」，然均著錄三卷；《郡齋讀書志》著錄一卷，然鬼公武在其解題中云：「所著詩二百一十首，宜城處士王士源序次爲三卷，今併爲一。」可見這是一個經過鬼公武合併的本子，其來源仍然出于王士源的那個三卷本。

現存宋蜀刻本《孟浩然詩集》三卷，鈐有元代「翰林國史院官書」朱文大長印，原爲吳縣黃氏士禮居所藏，後歸聊城楊氏海源閣，又歸德化李氏木犀軒，無錫楊氏秋草齋，南海潘氏寶禮堂，今藏北京圖書館。書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雙欄。前有王士源、韋滔二序，分上、中、下三卷，收詩二百十二首（二）。此本逐卷意編，不顯立類目，但從其內容考核，實分爲遊覽、贈答、旅行、送別、宴樂、懷思、田園等七類。這種分類編排的形式，在以後的元刻劉須溪評點本、明刻《唐百家詩》本、顧道洪本、汲古閣本等，除所收首數有所不同外，均依宋本採取分類編排這一形式。

另一類採取分體編排形式，現所見最早的是刊印於正德年間的明銅活字印本。此本三卷，以五古、七古爲第一卷，五律爲第二卷，五排、七律、五絕、七絕爲第三卷，除卷數與宋本相同外，其編排次序已進行了徹底調整。此後刊印的一些四卷、二卷本大率均依這種分體形式排列。

從所見各本收錄首數看，宋本收詩最少，爲二百十二首，至明銅活字本，收詩數量已達二百六十一

首，增加了近五十首。汲古閣本連「拾遺」在內，共二百六十五首，較活字本又有增加。有人以爲元明刻本較宋本多出的篇目，「俱他人詩，爲俗子竄入」。但如果根據實際情況加以考察，事實並非如此。如明刻孟集中有《盧明府早秋宴張郎中海園即事》、《同盧明府早秋夜宴張郎中海亭》二詩，所寫內容極爲近似，前詩一作盧象詩，後詩當爲孟之和作，而宋本則僅錄前一首而不錄孟之和詩；又如《山中逢道士雲公》、《洗然弟竹亭》、《人日登南陽驛門亭子懷漢川諸友》、《歲除夜會樂城張少府宅》、《廣陵別薛八》、《張七及辛大見尋南亭醉作》等詩，均可肯定爲浩然所作，而宋本亦均不載。又據王士源序云：「詩或缺逸未成，而製思清美，及他人酬贈，咸錄次而不棄。」而今存宋本亦未見有「缺逸未成」之逸句附入。由此可見，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宋刻三卷本，已不是王士源編集時的原貌，可能已在流傳過程中有所遺佚，而元、明以後所作的補充，還是有一定的根據^(二)。

由於宋本收詩數量較少，而其明顯之訛誤甚多，故此次整理時採用《四部叢刊》影印的明刊四卷本作爲底本。這個本子雖然經過明人重新編排，失去了王士源編集時的原貌，但由於此本收詩數量較多，文字錯誤較少，與其他各本相比較，還不失爲一個較好的本子。用它作底本，可以避免作較多的以動。這次採用來作爲對校的本子，有下列幾種：

- 一、《孟浩然詩集》三卷。宋蜀刻本（簡稱「宋本」）；
- 二、《孟浩然集》三卷。明正德初銅活字印《唐五十家詩集》本（簡稱「活字本」）；
- 三、《孟浩然集》三卷。明嘉靖十九年朱警輯《唐百家詩》本（簡稱「唐百家詩」）；